读天下

周恩来与“文革”时期的铁路运输

尹家民

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大串连”导致铁路运输几乎瘫痪

1966年,“文革”风暴5月即起,8月加剧。自8月下旬,红卫兵又开始了一项举动:实行全国性的“大串连”。北京一些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开始离京“南下”“北上”“东进”“西征”,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

红卫兵大串联把铁路搞乱了。铁路一乱,煤就运不出来,没有煤工厂就不冒烟。那时,周恩来总理每天管铁路调度,也每天抓煤炭生产,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周恩来曾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

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各地铁路交通部门不断向总理值班室告急。

事实上,“大串连”不仅给交通运输带来了压力,还带来了其他问题,比如南方来京串联的学生由于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引起传染病流行,北京各医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都躺满了病人。安排好来京红卫兵的吃住同样是个重担,这副担子又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他想方设法,费尽心思,后来连中南海国务院办公的地方也住进了几千名红卫兵。

转折点是上海的“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9日,周恩来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批驳只强调“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以便刹住借“革命”冲击生产的风。然而不想11月10日,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赴北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员,在安亭(上海嘉定境内)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20小时。

“安亭事件”发生后不久,周恩来找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他们一人抓计划会议(安排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人抓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这时,早就对周恩来等心存不满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开始行动起来。11月13日,陈伯达拿出一份由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白写有“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这等于规定工交企业也要像学校一样闹“革命”。由此大大小小的“安亭事件”势将层出不穷,全国工交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将被打乱,这是同周恩来的主张针锋相对的。

陈伯达提出的文稿一提到工交座谈会上讨论,立刻遭到与会各地、各部门负责人的激烈反对。大家赞同周恩来的主张:工矿企业必须和文教部门有所区别,不能停产闹革命。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谷牧整理出一份《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但这个文件刚定稿,陈伯达就打电话给谷牧、余秋里,提出严厉的指责。谷、余二人对此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的汇报。”

11月22日中午,在周恩来、陶铸、李富春参加的碰头会上,谷牧等汇报了几天来座谈会的情况和陈伯达的态度。当晚,周恩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表示文件可以在听取工人意见后继续修改,争取在12月发出。

11月24日,周恩来来到京西宾馆工交座谈会讨论会场,听取大家的意见。在周恩来面前,这些积压了几个月不满情绪的领导干部将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发泄了出来,刘澜波、吕正操、吕东等说到最后都站了起来,慷慨陈词。大家的话题已不仅仅是工交座谈会所讨论的文件,而是讲到国家动荡不安的形势,讲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担忧。周恩来听了,久久不语,最后向他们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牺牲;今天更应该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于赴汤蹈火,敢于站到潮流里面去。只有这样,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没,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周恩来这番话,中心是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他常常冷静地从比较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面前的问题,他觉得不能听任老同志们发泄情绪。

周恩来坚持“生产不能停、铁路不能停”的努力,是“文革”先锋们所不能容忍的。时过一周,事态果然发生逆转。12月4日至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针对工交座谈会的讨论情况和会议形成的文件,公然指责说:工交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会上,张春桥还指着汇报人谷牧训斥道:“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突然袭击”。正当谷牧在考虑该如何回答时,周恩来已经严肃地对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他们的发言,明显直接针对周恩来,所举事例全都是周恩来直接过问和支持的。这一点,大家心里都十分明白。周恩来坐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一语不发,目光空空地望着前方,会场里的空气十分凝重。

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施压下,周恩来、陶铸等试图通过限制“革命”来保障生产的努力,最终还是落空了。从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合法地进入工交、财贸、农业、科研等领域,“停产闹革命”风行全国。

周恩来都找不到铁道部部长

1967年1月6日之后,受“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影响,“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派性武斗盛行。1月22日,铁道部被造反派“夺权”,一时间,全国各地铁路、轮船交通呈现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但部长们仍被揪斗。

1966年底,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就曾“失踪”了好几天,他被造反派揪走后藏了起来。连周恩来都弄不清是哪一派揪走了吕部长,是否安全。过了两天,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深夜里,吕正操却突然来到了西花厅,他瘦了一圈。当他发现玻璃橱里有只大橘子,拿过来便剥了吃,嘴里还说道:“我也造总理一个反!”他实在是又渴又饿。他不知道这是工作人员给总理留下的仅有的一个大橘子,准备在后半夜给总理吃的。

周恩来见到吕正操后就和他讨论起铁路运输问题,当时周恩来正计划成立一个全国铁路系统联系总站,以保证铁路运输,打算让吕正操来抓这件事。但江青、陈伯达等人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先下手为强,就在吕正操要办这件事的当天晚上公开点了他的名,煽动造反派批斗吕正操。

1967年1月13日,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斗吕正操的万人大会。正在批斗节节升级之时,周恩来闻讯赶到会场,眼一瞪,对主持批斗会的头头说:“你们不应该随便揪我的部长,吕正操即使工作中有错误,也应该让他工作,戴罪立功。”见造反派不敢再造次,周恩来把吕正操交给在会场下值勤的铁道兵战士,让他们护送吕回家,并一再叮嘱:“要保证吕正操的安全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准进家揪人。”

2月1日,当周恩来再次接见铁道部革命造反派时,终于发起怒来:“再这样下去,我要把铁道部实行军事管理,你们这样做是玷污了二七传统的铁路工人的声誉!我给你们大小会开过7次,全国交通大动脉不可一刻中断……不管在小道理面前、大道理面前都要抛掉一个‘私’字。”

自“文革”开始后,周恩来就指示铁道部:“铁路上不论什么时候发生重要的事情,都要立即报告给我,不要怕影响我的休息。”他每天都要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了解铁路运输情况。不论哪个地方的铁路、航运发生了问题,周恩来总是不分昼夜立即处理。周恩来这种对交通命脉的重点维护,为减轻“文革”动乱对国家经济的破坏起了关键作用。

(摘自《红墙知情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序与跋

夹缝中的王爷

孙旭光

150年前的1860年9月,英法联军的隆隆炮声将大清王朝的咸丰皇帝赶到热河“狩猎”,而咸丰则将京城的烂摊子丢给了自己的弟弟——时年27岁的恭亲王奕䜣。几天后,攻入北京的侵略者悍然将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付之一炬。临危受命的奕䜣亲历了种种耻辱,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以割地赔款的代价使内忧外患的帝国有了难得的平静。

可能恭亲王本人也没有想到,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将会在大清王朝扮演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在历史浪潮的颠簸中,恭亲王站到了舵手的岗位上,极力维持着大清帝国这艘破败的巨轮缓慢前行,直至心力交瘁。

回顾起来,恭亲王奕䜣的一生确实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先是在与咸丰的储君之争中功亏一篑,被封为恭亲王后不久便受到咸丰的猜忌和排挤。经过与外国交涉的历练,勇于任事的奕䜣开始奠定自己在政坛的地位。咸丰死后,他抓住机遇,同慈禧共同发动辛酉政变,控制了中枢机关,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成为权势显赫的铁帽子王。作为满清贵族中难得的有才识者,恭亲王奕䜣几乎一手导演了随后30年间的王朝改革,可谓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从总理衙门到洋务运动,从近代海军到近代教育,使本已痼疾缠身的王朝居然出现了颇具声势的“同光中兴”,可谓居功至伟。

遗憾的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奕䜣始终无法摆脱慈禧太后的阴影,不得不一次次在宦海沉浮中挣扎,最终抱憾辞世。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奕䜣,他的时代抱负和政治智慧至今仍值得后人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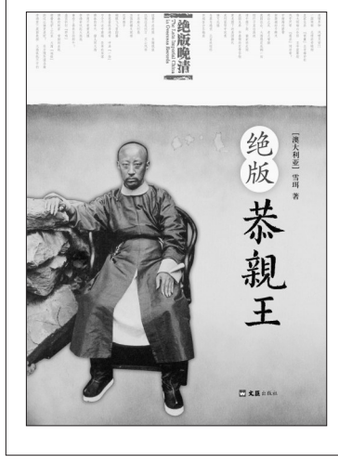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处于急剧发展时期,中国却裹足不前。清朝军队虽然屡屡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蒙羞,但多数士大夫仍然顽固地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旧梦中,无事则空谈气节,有事则颟顸畏缩。即使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恭亲王,也是在极为艰难地实施满腔抱负。事实证明,在其一生的改革努力中,奕䜣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保守势力的牵掣。他首先必须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谋生存,然后才能小心翼翼地为王朝谋发展,其代价便是个人命运的几番沉浮以及朝野舆论的毁誉参半。正如本书作者曾经感慨的:“尽管恭亲王早已获得了‘鬼子六’的雅号,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但是,除了蔡寿祺之类投机钻营的举报者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过怀疑。这种稳健的政治手法,使恭亲王在关键时刻,既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进,也能掩护激进的改革者从反对的声浪中逃生。”

岁月如烟,那位曾经书写了一段传奇的恭亲王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过他的府第倒是在历经沧海之后得以保存。如今,在风景秀丽的北京什刹海西南角,有一条静谧悠长的街巷,当年门前车水马龙的恭王府就坐落在这里。作为现存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建筑,恭王府已成为中外闻名的旅游景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近些年来这里游人如织,但绝大多数看客都是为着恭王府曾经的主人——著名权臣和珅而来的。现在的人们往往会对虚构的电视剧趋之若鹜,却对真实的历史漠然置之,这恐怕要算恭亲王奕䜣的又一重悲哀了吧。

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曾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在浮躁喧嚣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体味这其中的含义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现今恭王府的管理者,我由衷钦佩雪珥先生非凡的历史见地。虽然雪珥自称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但他多年来始终以独特的视角致力于中国近代改革史的研究,成果斐然,其已出版的《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及《国运1909》等作品均引起了热烈反响即是明证。在雪珥看来,恭王府曾经的主人——恭亲王奕䜣堪称是中国近代改革的源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本人曾多次前往恭王府实地搜寻资料,凭吊历史,最终写成《绝版恭亲王》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代亲王在那个云谲波诡的年代中的飒爽英姿和痛苦无奈……

毫无疑问,恭亲王的传奇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绝版,但我希望像雪珥先生这样的杰出研究永远不会绝版。

(《绝版恭亲王》一书已由文汇出版社于2010年10月出版)



逾200本中德“最美书籍”在港展出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孙浩)书籍不仅能带来精神享受,也能制造视觉乐趣。一项特别的展览“最美书籍设计——德国、中国内地及香港获奖书籍展览”近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幕,展出200余本中德“最美书籍”,借此展示书籍设计、制作工艺和印刷技术中蕴藏的创意之美。

此次展览展出的书籍均为各自主要书籍制作奖项的获奖作品,奖项包括德国“最美的书”、中国内地“最美的书”以及香港印制大奖中最佳印制书籍奖和优秀出版大奖。

据介绍,参展的内地2009年“最美的书”获奖作品包括王小波《白银时代》等一套三部,三部不同的书配置了相应的色彩,准确表达了各自的主题。同为2009年的获奖作品《坡芽歌书》则通过书籍整体的视觉意向强烈地传递出地方特色。2007年获奖作品《国学备览》将书名印刷在整套丛书的书脊上,既考虑了丛书的陈设功能,也用连续效果和夸张的外形美凸显这套书的经典品质。

香港是亚太地区的印刷出版重镇,本次参展作品也展示了“香港创造”的魅力。2008年获奖作品《粉末都市》通过图画表达出对本土历史的关注,犹如尝试一次香港人集体回忆的视觉重建。《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则在封面设计上运用具有水墨意蕴的万里长城摄影作品为基调,突出画册所力图彰显的中国艺术精神。

德国是全球领先的出版中心。此次参展的德国“最美书籍”题材广泛,从儿童读物、工具书、小说、歌曲集到摄影作品集,视觉语言或清新简约,或夸张浓郁,充满想象力。

德国“最美的书”评选活动由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自1951年创办。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自2003年以来每年举办内地“最美的书”评选,并推荐获奖作品参加世界“最美的书”评选。香港印制大奖则是香港该领域最具规模的专业比赛。

《八〇年代》:讲述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本报讯 (记者李静)近日,一部呈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群像的作品——《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者柳红曾经担任过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助手,并因此结识了许多经济学人。她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作者在这本书里,第一次全景式地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老、中、青三代经济学人的风采和历史;并附有105幅珍贵图片,其中不少图片是第一次发表。为此,作者采访了70多位亲历者,全书涉及500余人。

书中所谈及的这个经济学家群体,从空间而言,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集中了上下三代,第一代是指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人,他们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第二代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诸如刘国光、董辅礽、孙尚清、吴敬琏、厉以宁、赵人伟等,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第三代曾经是老三届,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经济改革的浪潮中。从贡献而言,他们承上启下,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发挥了一个学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

好书速递

《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

作者花了10多年的时间,在英国的小酒馆、赛马场、商店、夜总会以及车厢和街角,以其深邃的洞察力观察英格兰人的穿着、言谈及行为举止,包括用餐、喝酒、游戏、购物、开车、调情、打架、排队、工作等。该书分别以“聊天规则”和“行为规则”来归纳其观察到的现象,并在人类学的显微镜下,发现其中奇异迷人的文化,以及背后错综复杂的不成文的规矩、透着神秘感的行为规范。作者认为:英国人性格中最主要的、核心的特征是“社交拘泥症”。该书出版后,引起了英格兰人的争议,有人认为作者泄露了太多英格兰人的天机;有人则认为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英格兰人行事风格背后的潜规则;也有人认为,此书太好笑了。

([英]凯特·福克斯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俄罗斯》

对俄罗斯,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参观完魅力四射的莫斯科、历史悠久的圣彼得堡和风景迷人的贝加尔湖后,要想进一步了解俄罗斯,还应该探索更遥远的地方:远在西边的加里宁格勒克兰兹,那里是有着柔软金色海滩和普鲁士风情的老度假地;美丽的伏尔加河畔的格罗杰茨村庄,那里的民间艺术家和甜点制作师会以他们的杰作吸引你;迷人的埃利斯塔是欧洲唯一的佛教圣地,那里还有一个奇特的国际象棋城;有着400年历史的达格夫陵墓,是北奥塞梯的“亡灵之城”;如果想欣赏俄罗斯的文化和建筑,那就前往乌拉尔山区;如果想体验一下艰苦生活,就到西伯利亚的野外去探险;当然,俄式桑拿浴也是独一无二的享受。

(Lonely Planet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

作者在本书中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清初和清末两个时间段上,所论问题多是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努尔哈赤的一生、皇太极的即位问题、雍正是否夺嫡、奕訢受封恭亲王、慈禧太后的家族、关于李莲英的记述等。作者为皇室后裔,家藏有玉牒、圣旨、关防、祖先影像等,以其身份书写清史,不仅在材料、信息的占有方面,而且在观点和立场上都有独到之处。

(金承艺 著 中华书局2010年10月出版)

《雨果和圆明园》

1860年10月18日,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劫掠后焚毁。法国作家雨果写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以凛然正气谴责了这次强盗行径。今天,这封信已经走进我国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一位中国教授历经40多年的孜孜追寻,遍访法国和欧洲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几处雨果故居,查阅新版《雨果全集》,请教一流雨果研究专家,终于发现150年前雨果和圆明园的隐秘往事:巴特勒上尉到底是谁?雨果的信有没有发出?雨果为何对圆明园情有独钟?请跟随书中步履,揭开这封信的真实面目……

(程曾厚 撰文/摄影 中华书局2010年10月出版)

《设计中的设计》

原研哉,是日本著名的平面设计大师、无印良品(MUJI)艺术总监,曾设计日本长野冬季奥运会的节目纪念册和2005年爱知县万国博览会的文宣推广材料。本书是对原研哉的设计理念以及作品的沿承、发展的总结,本次版本是完全收录版,收录了许多以前国内未曾发行的内容,其中包括原研哉一些宝贵的设计概念及由其所衍生的一系列设计实践。作为日本设计师的中坚力量,原研哉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当代日本设计的精髓。他以一双无视外部世界飞速发展变化的眼睛面对日常生活,以谦虚但同时尖锐的目光寻找设计被需要的所在,因此他的作品往往显现出一种独有的清新味道。

(原研哉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难忘一九五〇——志愿军入朝参战60周年图文实录》

今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为了纪念这场伟大的战争,新华出版社推出的这部书向读者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画卷。这本书名为《难忘一九五〇》,内容实际上展示了从1950年到1958年抗美援朝的全景。从决策出兵,到出国第一仗、决战清川江;从越过三八线、攻克汉城,到边打边谈;从喋血上甘岭,到赢得和平实现停战,直到英雄儿女最后一批凯旋回国。全书以20万朴实的文字和360幅珍贵的历史照片,用纪实手法记录了抗美援朝战争全貌。

作者丁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多年从事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曾参与《抗美援朝战争史》等多部军史的撰写。全书图片主要由新华社摄影部提供,有重要史料价值。

(丁伟 著 新华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